

外国文学资料

(内部刊物)

17

南京大学外文系欧美文化研究室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

前 言

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文坛摆脱了希特勒法西斯统治所造成的与世隔绝和万马齐喑的局面，又重新活跃起来。新的作品和新的作家陆续涌现，在国内国外都有一定的影响。在我国，过去对这一时期的德国文学（泛指用德语创作的文学），偏重于介绍东德的作家作品，而对西德、奥地利、瑞士等国的文学成就却介绍很少。作为弥补这一缺陷的初步尝试，我们编印了这期当代德语作家短篇小说专辑。

本辑共编译短篇小说十九篇（其中《雪人碑》与《判决》两篇是从长篇中节选出来的完整故事）。这些作者都是当代有声望、有影响的作家。虽然这些短篇不一定是他们的代表作，但是通过它们，读者能对这些作家的创作风格以及他们笔下所反映的资本主义社会面貌有所了解。我们编选的目的，不是推荐欣赏，而在于介绍情况。

这些作品的内容大致是：对战争后果的写照（如《红猫》和《夜里老鼠是睡觉的》等篇）和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的种种社会现象及人们的心理状态（如《长跑运动员》和《一切》等篇）。也有一些是采用离奇的写作手法（如《镜中事逆叙》）或通过离奇的故事（如《海豚》、《隧道》）来表达作者对现实的看法。

我系德语教研室同志翻译了本辑大部份篇目，在此谨致谢意。

因我们水平有限，编译中一定会有不少缺点和错误，请予批评指正。

编 者

目 录

带花圈的人	米尔贝格尔 (1)
红猫	林瑟 (4)
上帝的裁决	福勒 (8)
海豚	潘德尔特 (10)
轻蔑的目光	库森贝格 (20)
镜中事逆叙	艾兴格 (23)
长跑运动员	伦茨 (29)
假面	格吕恩 (34)
拉起鱼兜来	斯哥茨 (38)
升天鞋	安得烈斯 (43)
夜里老鼠是睡觉的	波尔钦尔特 (47)
寻人记	瓦尔泽 (50)
威尼斯炉匠的奇遇	安得施 (54)
董事长的欢迎辞	汉德克 (59)
判决	施勒尔茨 (62)
要做出点事情来	伯尔 (68)
雪人碑	诺萨克 (72)
隧道	迪伦马特 (79)
一切	巴赫曼 (85)

带花圈的人

约瑟夫·米尔贝格尔

上校在罗斯托克惊慌地感到末日临头了。如果不是事实强迫他去相信这一点，他还一直以为是不可能的呐！该城已三面受到苏军的包围。

上校曾在法国、意大利、苏联和巴尔干半岛以及其他许多地方打过仗。因此他难以理解，他现在似乎已不是一个陆军上校了，过去他所向披靡的巨大空间只剩下一间可怜营房的营房。在这里他还将会最后被枪决或者被送进俘虏营去。他必须作出决断。他最初的也是唯一的想法是不能被俘。于是他往裤袋里塞满了军用手表，大衣袋里填满了子弹，挎着冲锋枪，上路去自谋出路了。后来他又把冲锋枪连同子弹一起扔掉，只保留着所有的军用手表。上校的军装还穿在身上。他曾经为这身军装而感到自豪——他当了十二年的兵，得到提拔才捞到这身军装的；而现在他却不得不尽快地摆脱掉它。

在靠近布霍茨的地方，他找了一位农民，想用他的军装换一套便服穿，因为这里已不是两军对阵的鏖战地带了。但这位农民并没有听从上校的话。他耸了耸肩膀说：“衣服当然是很稀罕的，可是我不能穿着军装下田劳动。”上校把一块表放到桌子上。农民望望它，然后说：“偷来的。不过，可以用它换一件上装。”此时上校又摸了第二块表放到桌子上，以此又换得一条裤子。

农民要妥当地处理掉这身军装。敬重军装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是的，这样的情况是不会永久的。现在的问题是要尽力挣扎到家。家很远，在南方的一个小镇上，而他现在是在遥远的北方。

上校想在农民家里过夜，但农民没有同意，因为这是危险的事。

当夜幕开始降临时，上校向坟场荒冢走去。他环视一下四周，走到一个新坟边，拿起一个新作的花圈，然后找到一片树林，躺下睡觉。夜，是阴冷的，上校的身上盖着松树枝做成的花圈。

上校身边带着花圈是件好事。第二天中午他就碰上了第一批到来的英国士兵。他们没有留意这位带着花圈去邻村参加丧葬仪式的人。

几天过去了，上校不停息地为去参加一个丧葬仪式在路上奔波着，身边始终带着花圈。因为那个花圈磨坏了，他就到一个坟墓上又换了一个轻些的，完全用纸糊的花圈。由于下了雨，第二天纸花圈就毁坏了。他又非得去再搞一个新的不可。

上校自己的身体也开始支持不住了。漫长的路途，露天的宿营，用他的军用表换来糊口的少量食品……。有一次他不得不把一块表白白送给一位农民而毫无所得，因为不

这样，农民就要把这个过去当兵的人出卖给英国人。但是花圈却有的是，到处都有新冢。

有一天，当上校为了重换一个新的花圈向坟场走去的时候，那里正在举行葬礼，上校因而不能马上离开。他就干脆也把他的花圈放到坟边，参加了这次葬礼。随后他被邀请吃丧斋，这是他第一次吃饱肚皮。

另有一次，他碰上了一辆美国人的小汽车，小汽车没有继续向前开而停了下来。司机对他说：“喂，你难道还没到那儿吗？”——“哪儿？”陆军上校问道。——“到你送花圈的地方。”——“什么？”——“我在四天前就看到了你。”——“我吗？——那是当然的啰，火车还没通呢。”——“你还要去参加一个葬礼吗？真伤心！”——“什么？”——“四天前你扛的是另一个花圈。”——“我马上到了，你看到的那个村庄就是。”——“好！请你给我一块表！”——“表？”上校像个新兵似的故意装疯卖傻地反问道。——“是的，就是你用来换取食物的那些表。”——上校至此只得摸出一块表来。他想，他们战胜了我们，要给我们带来文明，然而他们却没有一块象样的表。他也了解到，美国人看到表就象魔鬼见了可怜的灵魂一样，是十分贪婪的。那个美国人得了表就象孩子似的欣喜若狂，立刻把它带到手腕上。然后说：“行了！”他让上校上车，带着他走了。

车开了很远，上校才被允许重新拿起他的花圈下车，他又靠着他的两只脚继续前进。就这样，他迅速地朝南方走了相当一段路程。这是一件好事，因为继大衣口袋空了之后，现在裤子口袋也已经空了。和美国人的交道打得还不错。他想，幽默感是有一定价值的。但他却幽默不起来了。

上校一如既往地赶着走他的路，身边总带着花圈。他一会儿把它扛在右肩，一会儿又换到左肩，从这个坟地到那个坟地。越是走近他的家，花圈也就变得越沉重，肚子也越来越饿，两脚也越来越疲乏。一切都是那样的可悲。从波罗的海到阿尔卑斯山脚下，他扛着花圈穿过了整个德国，心里只想从这个坟地到那个坟地，从一个新冢到另一个新冢，似乎整个德国只有坟地和新冢。他如此地伪装着自己，他不再是一个陆军上校了，不再是刀剑上飘着纓带的威武的军官了，根本不是了。他是一个为死人扛花圈的人。这花圈就象长在他的身上一样，他没有它是根本不能想象的。现在他更不能草率地丢掉它，因为在这一地区人们大概已经认识他了。就这样，他带着这十分累赘又可憎恶的、但能保证他自由的东西到了家。

当他的妻子见到了自己的丈夫，而且还带着一个花圈时，她那原已苍白的脸色不能变得更苍白了。

“一年了——！”她结结巴巴地说。

是啊，他们已经一年没有见面了。这一年就像五年一样地长。上校似乎觉得他的妻子老了许多。她还只是一个军曹的妻子而没有成为军官太太。可是当他过去当上军官的时候，这一点却并不是十分重要的。而现在她连个军曹的妻子都称不上了，因为她的丈夫只不过是这个小兵而已。这些现在都算不了什么了。

“你要不要先吃点东西？”

“什么叫先吃点东西？”上校不乐意地说：“这样长途跋涉之后，我当然饿了！”

“自然，花圈我们可以等一下再送到坟上去。我很高兴的是，你已经知道那件事，不用我再对你说了。”她说着就把两只干瘦的手捂到脸上，哭了。“但这事不能怪我，真的，我当时正好出门去换吃的东西。当低空轰炸机来袭击时，霍茨正在院子里玩。是五月三日，就在他满五周岁的前几天。他立刻就死了。”

“这些猪狗东西！”上校喊叫着，就像站在操沱场上的小兵一样。“就在战争结束的前夜！卑鄙！向老百姓开枪！向孩子们开枪！匪徒！”

他站起来，拿起花圈。

“在你没吃点东西以前，你就要——”

“我没有胃口。”

他们出发了。上校扛着花圈从波罗的海到阿尔卑斯山穿过了整个德国。现在，当他到达终点后，他却把花圈放到了自己孩子的坟墓上。他站了一会，十分困乏，就像他数天以来一直带着走的花圈一样已经完全破损了。他四肢颤抖。他本想像个士兵一样做个立正的姿势，但没有成功。

妇人俯下身子，用手尽力去整理好花圈上已压坏和弄皱了的纸花。然后把它放到了坟顶上，但马上又把它推到了旁边。因为那儿，紫罗兰开出了花朵，就好象孩子的蓝眼睛透过窄小的坟顶向外张望。它们不能被已经压皱了的纸花圈盖住，它们要见太阳。

（陈 洪 元 译）

*

*

*

约瑟夫·米尔贝格尔（Josef Mühlberger）

1903年生于波希米亚，二次大战后在西德当报纸编辑。

红 猫

路易斯·林瑟

我老是要想起那只魔鬼似的红猫，并且，我不知道我所做的是不是对。事情是这么开始的：我当时坐在我家院子里漏斗形的炸弹坑旁的石头堆上。这堆石堆就是我们房子的大半部分。那一小半房子还没倒塌，我们就住在那里，就是我，妈妈，彼得和莱妮——我的弟弟和妹妹。就这样，我坐在石头堆上，那儿到处已经长出青草，荨麻和别的植物。我手里拿着块面包，面包已经发硬了。可是妈妈说，陈面包比新鲜面包更有营养。她这么说，实际上是因为她认为，陈面包要嚼老半天，那么少吃点也就觉得饱了。可我却没有这种感觉。忽然，一小块面包屑掉到地上，我弯下腰来想捡。就在这一刹那，忽然从荨麻丛里伸出一只红红的脚爪，把这块面包勾过去了。这事发生得这么快，使我愣住了。这时我看见荨麻丛中伏着一只猫，红得象只狐狸，瘦极了。“该死的畜牲！”我骂了一声，朝它扔了一块石头。我根本没打算打中它，只是想赶走它。可是我大概是打中了它，它叫了，只叫了一声，但活象个孩子哭。它并不跑开。我用石头掷了它，倒觉得有点不安起来。我唤它，可它又不从荨麻丛里出来。它呼吸很快。我看见它肚皮上红色的毛皮在上下起伏着。它老用它那双绿眼睛盯住我。这时我就问它：“你到底想干什么？”这真是发神经，因为它不是人，是不好和它讲话的呀。后来我就生它的气了，也生我自己的气。我干脆不再朝那边看，只是很快地把我的面包咽了下去。最后的一口——那还是很大的一块呢，我扔给了它，就气冲冲地走开了。

前院里，彼得和莱妮在切豆角。他们把绿豆角朝嘴里填，只听到嚼豆角的声音。莱妮轻轻问我，还有没有一点面包。“哎，”我说，“你不是分到和我一样大的一块面包吗？你才九岁，我都十三了。年纪大些的，该吃得多些呢。”“是的。”她说，别的再也没说什么。这时彼得说道：“因为她把她的面包给了猫了。”“什么样儿的猫？”我问道。“嗨，”莱妮说，“来了那么只猫，红得象只小狐狸，瘦得吓死人。我正要吃我那块面包时，它老盯着我。”“笨蛋，”我生气地说，“现在连我们自己都没有什么可吃的时候，还要去喂猫！”但她只是朝我耸了耸肩，很快地朝彼得看了一眼。他脸涨红了，肯定他也把他的面包给了那只猫了。这时我当真生了气，就很快地走开了。

我走到大街上，那里停着一辆美国人的汽车，又大又长，我相信是一辆“别克”，这时，开车的人问我市政府在哪里。他是用英文问的，我倒也会一点英文。

“The next street（下一条街）”我说，“and then left and then（然后向左，然后……）”，“一直走”这个词的英文怎么说我不知道，我就用手指给他看，他懂了。

“And behind the church is the marketplace with the Rathaus(教堂后面就是市政府所在的广场了)”我自认为这是挺棒的美国话了。坐在车里的女人给了我几片白面包，雪白的。我打开一看，里面还夹着香肠，厚厚的一片。我马上拿着面包奔回家。我进厨房时，两个小家伙正在把什么东西藏在沙发底下，可是我已经看到了。就是那只红猫。地上洒了一点牛奶，这下我全明白了。“你们是疯了吧？”我高声叫道，“现在我们四个人每天才有半公升薄牛奶呀！”我把沙发下面的猫拽出来，从窗户扔了出去。他俩一声不吭。后来我就把美国人给的面包切成四份，把妈妈的那份放到食橱里去了。

“你从哪儿搞来的？”他们问，一面战战兢兢地望着我。“偷来的。”我说完就出去了。我只想赶快到街上去看看还有没有掉下来的煤块，因为运煤的车子开过去，有时会掉下些来的。这时，红猫坐在前院，那么样地朝上瞅着我。“走开！”我说着并用脚向它踢去。可是它不走开。它只是张开它那小小的嘴说“喵。”它不是象旁的猫那样叫唤，它真的是说的，这我可没法解释。这时它用它那绿眼睛直瞪瞪地盯住我。我满肚子不高兴地撕下一块美国人给的白面包向它扔过去，后来我又后悔了。

我到街上时，已经有两个孩子在那儿了，都是比我年纪大的。他们把煤都捡光了。我只好走开。他们捡了满满一桶。我很快地朝桶里唾了一口。要不是那只猫，我不就一个人全捡来了吗？我们不就可以足足地烧一顿晚饭了吗？多好多亮的煤块呵！后来我又碰上一辆装着春马铃薯的大车，我走上前去，撞了撞大车，这时滚下来几个马铃薯，接着又滚下来几个。我把这些马铃薯塞进口袋和帽子里去。赶大车的人回头张望时，我对他说：“您的马铃薯丢了。”然后我就赶快回家去了。家里就妈妈一个人，她怀里坐着那只猫。“晦气！”我说，“这只畜牲怎么又来了？”“说话别这么粗野！”妈妈说道，“这是只无主的猫，天晓得它有多长时间没吃一点东西了。你瞧它瘦成什么样子了。”“我们不也瘦吗？”我说。“我把我的面包给了它一点。”她说并斜着眼看了我一下。我想起了我们的面包、牛奶和美国人给的白面包，可是我什么也没说。然后我们煮马铃薯，妈妈挺高兴。但是她并没有问这些马铃薯是从哪里来的。其实她是可以问我的。后来妈妈不加牛奶单喝她的咖啡，她们几个全都注意地看着那只红色的畜牲怎样地把牛奶舐个精光。后来它终于从窗户里跳出去了。我赶紧关上窗，舒了一口气。

清早六点钟，我去排队买菜。八点钟回家时，弟弟和妹妹正在吃早饭。他们当中的椅子上蹲着那只畜牲，它从莱妮的小盘子里大嚼泡软了的面包。过了几分钟，妈妈回来了。她五点半钟就到肉铺去排队了。小猫马上扑向她。我不知道妈妈是怎么想的，她随手就扔下一块香肠给它。这虽然是不不要票的，一种灰不溜秋的东西，可是夹在我们的面包里，终究也是不错的，妈妈是应该知道这一点的。我强按着怒火，拿起帽子来就走了。我从地窖里取出那辆旧自行车，骑到城外去。那里的一个水塘里有鱼。我没有钓鱼竿，只有一根头上有两个尖钉子的棍子，可以用来叉鱼。我总是走运的，这次也这样。还不到十点钟，我已经搞到两条挺不错的、足够吃一顿午饭的鱼了。我尽快地骑车回家，把鱼放到厨房里的桌子上，就赶快到地窖子里去告诉妈妈，她正在那里洗衣服。她立刻就跟得上来了。但是那儿却只剩了一条鱼，而且偏偏是条小的。窗户上趴着那只红鬼，还在大嚼它最后的一口。我怒不可遏，向它扔了一块木头，打中了它。它就从窗台

上滚下去了。我听见它象只口袋似地“扑通”一声跌到院子里去了。“嗨，”我说，“这下子够它呛的了！”就在这时，妈妈“啪”地给了我一记耳光。我十三岁了，可以肯定，五岁以后就再也没挨过耳光了。“你这个虐待动物的家伙！”妈妈嚷道。她因为我而气得脸都发白了。我只好走了。虽然如此，中午还是烧了色拉鱼，当然是土豆比鱼多了。不管怎么说，我们总算摆脱了这只红色的畜牲。但谁也不认为情况因此变得好些了。弟弟妹妹跑遍院子不断地唤猫，妈妈每天晚上用个小碗盛了牛奶放在门前，责备地看看我。这时我自己也开始在各个角落里寻找这只猫。它可能病了躺在什么地方或者是死了。但是三天以后猫又来了。它一瘸一拐，腿上有伤，在右前腿上。这是我扔的木头打的。妈妈给它包扎起来，又给了它吃的。打这时起，它每天都来，没有一顿饭见不到它。我们当中没有一个在它面前保留什么东西。我们刚一吃东西，它就坐到跟前盯住人看。她想要的一切，我们都给了它。我也一样，虽然我心里是很恼火的。它越来越肥了，我想，它倒是只挺漂亮的猫呢。后来到了45—46年之交的冬天。这时我们的确什么吃的也没有了。有几个星期，一克肉也没有，只有冻马铃薯。衣服挂在身上飘飘荡荡的。有一次，由于饿得难受，莱妮在面包铺里偷了一块面包，可这事只有我知道。二月初，我对妈妈说：“现在我们宰了这只畜牲吧。”“什么畜牲？”她问道，目光锐利地看着我。“那只猫嘛。”我说着并装出无所谓的样子，可是我已知道会发生什么了。他们立刻就都攻击起我来了。“什么？我们的猫？你不害臊吗？”“不，”我说，“我不害臊。我们用我们吃的东西喂它，它已经肥得象只小猪了，它还年轻是吧？”但莱妮号哭起来，彼得在桌子下面踢了我一脚。妈妈伤心地说：“我真不相信你竟是个这么狠心的人。”猫正趴在灶上睡觉。它真的很肥胖，又懒得要命，你再也别想从家里赶走它了。四月时，土豆没有了，我们不知道该吃什么了。有一天，我完全象发疯了似地，把它提到跟前说：“听着，我们什么也没有了，你自己看不见吗？”我把空马铃薯袋和空面包箱指给它看，对它说：“走吧，你看到的，我们这儿是付什么样子。”但是它只是眨眨眼，在灶上兜着圈子。我气得大叫起来，朝桌子打了一拳，它却毫不在意。这时我抓住它夹到手臂底下。外面已经有点暗了，弟弟妹妹和妈妈一起到路基边捡煤去了。这只红猫懒得就干脆听任人带走。我走到河边，忽然碰到一个人。他问我这只猫是不是卖的。“卖的。”我说，并高兴起来。但他只是笑笑就走开了。后来我一下子到了河边。河里有浮冰，河上有雾，天冷得很。猫紧挨着我。我摸了摸它，然后就和它说开话了：“这可不行呵，我的弟弟妹妹挨着饿，你却肥得这样，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突然，我大声叫起来，抓住猫的后腿，把它向一根树干上摔过去。它只是叫唤着，还远远没有死。我又把它向一个冰块上撞，这么一来，它头上就开了一个口子，血涌流出来，弄得雪地上到处是深色的血斑。它象个孩子似地叫唤着。我很想住手，但现在已是非干到底不可了。我不断地把它向冰上摔着。什么东西发出喀喇喇的声音，我不知道这是它的骨头还是冰给敲碎了。它还是没有死。人们说猫有七条命，但这只猫的命更长。我每摔一下，它就叫唤一声，突然我也喊起来。在严寒中我累得浑身是汗，后来它死了。我把它扔到河里去，在雪里洗了洗手。当我再次张望时，那只猫已远远地漂浮在冰块当中，后来就在雾霭中消失了。我冷得要命，但我还不想回家。我在城里溜了半天，可后来还是

回家了。“你怎么了？”妈妈问，“你脸色苍白得象纸一样。你上衣上面是什么血？”
“我流的鼻血。”我说。她没有看我，走到炉灶前给我煮了薄荷茶。突然我觉得不好受，赶紧跑了出去，上了床。过了一会儿妈妈又来了，她平静地说：“我理解你了。再别想那回事了。”可是后来我听见彼得和莱妮捂着枕头哭了半夜。现在我并不知道，我弄死红猫是否对头。凭良心说，这样一只猫是吃不了多少东西的。

(徐 晓 蓉 译)

*

*

*

路易斯·林瑟 (Luise Rinser)

1911年生于皮茨林，西德女小说家。

上帝的裁决

哈因茨·栗赛

一四一二年六月的一个早晨，在卡拉勃林地方，小山城F的近郊，发现一具男尸。显然，此人是夜间遭劫遇害的。由于死者身上找不到任何可以说明身份的东西，尸体于是送到城里，放在陈尸所，以供众览。有几个在那儿观看的人，顿时肯定地说，凶杀案发生前的那个傍晚，他们曾经见过这人。他们说：他在客栈里对人说过，自己是做买卖的，经商在外。法官随即传询客栈老板，老板证实此事，还说：陌生人饱餐一顿之后，说要往前赶路，很晚很晚还离店远去。一道离开的，是两个年轻人，吃饭跟商人同坐一桌，还一起进行了攀谈，商人又替他俩付了饭钱。法官问道，这两个年轻人是不是住在F城，老板肯定地说，就住本城，还报了他们的名字：一个叫乌尔比尼，另一个叫维吉里奥。

法官就把两个人传来。两个人声称，当初在客栈门口就跟商人分了手。立即对他俩的住处进行搜查，也没发现什么疑迹。尽管如此，法官还是下令把他们扣押了。之后几天，多次提审，不管审问多么巧妙，法官还是连罪证的影子都没见着。审问末了，使他坚信：不管是乌尔比尼，还是维吉里奥，都不会是谋杀商人的凶手。然而，又下不了决心开释他们。

一天夜里，实在决定不下，法官就想出一个主意：让上帝裁决去吧。翌日，命令先提乌尔比尼。问他，关押期间，有没有做过什么梦。乌尔比尼诧异地望着法官，说道：做过。甚至梦见一些非常离奇的事儿：梦里，自己一动也不动地躺在路上，想动也动弹不了。天色已暗，生怕偶然有辆车子过来，把自己轧死，尤其听到远处隆隆的车子声音，畏惧心理就更加使他痛苦！但结果并没有什么车子过来。甦醒过来的时候，由于噩梦惊骇，已是一身冷汗。

法官凝思一阵，命令第二天清晨，将乌尔比尼捆住手脚，放在郊外农民送货上市必经的边路上面，要他在那儿躺上两个钟头；法官又以刑罚威胁农民，要他们照常赶车，只当边路畅通无阻。乌尔比尼要是经受得住这种考验，那就获得开释。

第二天，法官亲临乌尔比尼所躺的地点；同法警一直等到自己规定的抉择时限。可在这段时间里面，一辆车子也没过来，使他大为惊异。他亲自给乌尔比尼松了绑，而后命令两名士兵，沿路到山脚下的村子上去，了解一下，农民今天为什么不上城里去赶市。不久部下向他报告，说在乌尔比尼躺卧不远的地方，夜里曾经发生岩壁崩裂，路给石头泥块堵塞了。

从前面的事情里面，法官看出，有人事实上已经替自己卸掉了裁决的负担。于是，再来传唤维吉里奥。也问道，关押期间，有没有梦见什么。犯人微笑起来，“梦见过，”他说，“我把手伸到议会大厦门口那个石狮的嘴里去了。”

法官想到，他也是无罪的人。

“石狮一口把我手咬住了”。维吉里奥继续说道。

“石头做的狮子竟然也会咬起人来？”法官摇了摇头，惊奇地问道。

“这本来是做的梦嘛！”犯人答道。

“那好吧，”法官道，“咱们就到议会大厦去，让你把手伸到石狮嘴里，要是它不咬你，我就下令把你放掉。”

法官带着犯人和两个狱卒，穿过马路，往议会大厦走去。一群人尾随着，——乌尔比尼得救的消息已经飞快地传开了；这个奇事使得许许多多的人产生一种愿望，要去亲自看看如何考验维吉里奥的情况。从法警的嘴里，听到维吉里奥为了证明自己无罪需要怎样做的时候，大家哄然大笑起来——就连维吉里奥自己，在踏上议会大厦门前的台阶，看到市场上那些喜悦的面孔的时候，也情不自禁地微微笑了起来。他肯定自己有救了，就微笑着，把右手伸到那石狮张开的嘴里去。但他忽然疼得叫了一声，倏地把手缩了回来。近处的人看到，随着维吉里奥急速的动作，一只蝎子掉到议会大厦的台阶上来——显然，是这只暗藏在石狮嘴里的蝎子，把维吉里奥的手刺了。

法官命令，仍收犯人入狱，并且规定，犯人受到的伤，不许任何人来给他医治，因为他已坚信不移：维吉里奥有罪。维吉里奥几个钟头之后，在剧痛之下，死去了。然而，法官对于谋杀商人这个案件的判决是大错而特错了。真正谋害商人的凶手，既非乌尔比尼，也非维吉里奥，而是另外的一个人。这人二十年后，在那不勒斯，躺在临终床上，供认了自己的罪孽。这事，F城没人知晓，法官也同样地不了解。不过，他即使了解，也不至于对自己所作的裁决是否公正表示怀疑，因为有谁敢说，惩罚会不是针对着另外一件连他——法官自己也毫不知情的罪行呢。表面上的联系往往是不存在的。如有，也是偷天换日。人，只能象法官所作的那样，提出问题而已。至于究竟能不能够去解开那个答案给他设置的谜，还是难以知晓的。

（高 剑 秋 译）

*

*

*

哈因茨·栗赛（Heinz Risse）

1898年生于迪塞尔多夫，西德作家。

海 豚

恩斯特·潘错尔特

“须作极短的旅行，我们今天就充分地足以证明，比鱼儿们还要悠然。”

《浮士德》第二部*

“我搜集侍役的材料”，那位健谈的陌生人主动坐到我桌旁，“我热切地搜罗他们，如同有人搜罗陶器、玻璃衬底彩色画，或有些人搜罗弦琴弦首一样。诚然，对后者我总觉得太野蛮，他们不管三七二十一把最出色的乐器颈部锯下来，然后象脑盖皮一样把它们挂在玻璃柜内。他们这样做的原因也仅仅在此。至于我却搜集侍役的材料。他们是些值得注意的人，尽管毕竟象每个行业一样，其中也有十足的无赖。我十分了解维也纳的侍役，也同样十分熟悉旧金山，开普顿或北京的侍役。他们各有其地方的特色，无论我在世界哪个角落遇到他们，都知道他们是侍役而不会弄错。他们在人类内部——不管是白种人，黄种人或是黑种人——组成一特别的属类，像达维斯秘密结社或神秘教义者结社**那样一类的社团。在这些侍役中我遇到过这个行业的真正大师，他们有的具备舞蹈家的性格和体态。只消留意看看这些人，就会给人一种艺术上的享受；他们看人十分老练，他们象一本正经的哲学家，如果您乐意也可称他们为诗人。您不妨尝试一下，把您的朋友或一些知名人士假想成侍役。这会很有趣和挺有启发性的。我不厌其烦地让维也纳那个矮小弓背的侍役给我解说菜单。他会生动地描述怎样烹调每道菜肴，使我仿佛置身厨房亲历其埶，垂涎欲滴。他在讴歌这些菜肴。至于佩罗吉酒保给我介绍的酒，简直令人心荡神驰。我在开罗还遇到一个侍役、一个魔术师。他把一只大汤碗放在桌上，听任我猜想里面要盛些什么。我碰碰运气猜道：香蕈汁烧松鸡。他拿餐巾——我认为这块布使侍役灵魂具体化——复盖在汤碗上，象变魔术那样嘴里喃喃一通，揭开盖，确是松鸡！这是在开罗呀！但我却在安通斯岛上，为我的收藏找到了珍品。这套收藏乃是我早期的收获。您听着，我愿把这个故事赠送给您，但我的配方是：三分之一的酒，三分之一的烟和三分之一的想像。”

* 郭沫若译，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

** 十六至十八世纪带有宗教色彩的秘密结社，以玫瑰和十字架为标记。

于是我叫人给他拿来一只酒杯。我给他又斟酒又递烟。那位侍役——附带说，是具有舞蹈家性格的——用意味深长的目光，让我弄清楚，我的客人的本性，叫我有所提防。其实，在这之前，我已猜到，这位陌生人是专靠讲故事谋生的。这确实是一行艰难的经营，因为不能老是找到象我这样喜闻的耳朵，虽则由于老练，他一眼就能觉察，可以打谁的主意，不然他决不会坐到我这儿来的。

当时我正想不出什么材料可写，所以也确实乐于有人送只故事。人们会问，为什么这个流浪幻想家自己不把这些东西写下来？这也正是他的厄运所在，他不会写作。他是蓦然虚构了这个故事的，他开始讲时似乎对故事的结尾究竟如何，还毫无所知呢。

我暗示那个担忧的侍役，我一切都清清楚楚。破费些也无妨，因为面对着我的那个讲故事的人是个酒徒。他有了酒才能编造故事，而为了能喝到酒，他也就不得不编造故事。

“好，您听着，”他双手小心地对着光举起酒瓶来，内行地察看印有酒的年代和产地的标签，朝酒瓶颌首嘉许，并润了下嘴唇品品酒味，然后开始了他的传奇之说。“我要讲关于安通斯岛的事。这是一个金色的仙境般的小岛。关于这个岛，当地传说它是从月亮上坠落下来的。据说，它确实不属于地球。我讲的是一则关于悲伤忧虑的侍役阿波罗和奇妙的鱼的故事”。

“阿波罗，”我疑惑地打断他，暗示他，我似乎已发现，他选择名字欠考虑，“他真的叫这个名字吗？”

“确实确实，”那位陌生人执拗着，有些恼怒。“这我无法变更，他真的叫阿波罗，尽管他同光耀华丽的艺术创造者*、使人解脱和归正的特尔斐**神毫不相干。他倒是挺象那不幸的马尔西阿斯神***，虽则他不是吹笛手，也不象那自命不凡、胆敢同神在音乐上较量的艺术家。这多不公平道啊！我讲的是那个同意竞赛的七弦琴神。神与神之间何等残忍暴戾！我总是同情地站在穷困的、惨遭剥皮的伟大艺术神马尔西阿斯一边。你有没有发现这样的怪事？许多艺术家和智者的面孔，象苏格拉底****或魏伦*****一样那付山鬼脸谱。安通斯那个侍役就象个山鬼。您熟悉马尔西阿斯，那个侍役看上去就象那付样子，或是酷象慕尼黑碗盘上死的半马半人怪物。我永远不会忘记他那付脸相。

在我纯然出于好奇初次去这岛时，还无人知道这个岛。它还有一个与它同名的迷人的小城市。那时我还年轻，计划游历全世界。今天我知道压根儿没有这必要。你只消置身于生活的一角，只要安心等待，不要不耐烦就行。不耐烦是一种危险的罪过。这样世

* 原系阿波罗 (Apo llo) 之别称。

** 特尔斐 (Delphinisch)，希腊城，阿波罗神殿所在处。

*** 马尔西阿斯神 (Marsyas)，古代夫利基阿国 (Phrygien) 自然界之神。阿波罗用七弦琴与马尔西阿斯的笛竞赛，阿波罗于琴声外复加以唱声而获胜，故活剥马尔西阿斯的皮罚其自命不凡。

**** 苏格拉底 (Sokrates)，古希腊哲学家 (公元前469—公元前399)。

***** 魏伦 (Verlaine)，法国象征派诗人 (1844—1896)。

界会自己来到你的身边，不管你要还是不要。我的祖父从未出过门，一字不识。有一天，歌德骑马以后，就曾经在我祖父屋内的桌旁坐着休息过。拿破仑乘着雪橇，从俄国回来也路过他那儿。我的一个熟人，当然也是侍役，是个可爱且又耐心的人。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图林根森林那田园景色的乡村，也就在那儿，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一头冲破巡回动物园兽栅的巴巴尔狮吞噬了。当然，这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我的讲故事的人看来真的被这件令人战栗的事所激动，虽然这是他方才编就的。他呷了一口酒，来冲刷一下这悲惨的回忆。我却有足够的理由怀疑，他不见得比他那位可怜的朋友在世上游历得广，尽管他想使我相信这点。他显露出一种按捺不住的要兜售他自矜博学的欲望。

“哦，我讲到哪里啦？”他擦擦眼，继续说，“岛，海，侍役阿波罗，对，完全就是这样！我是怎么去那里的呢？当时我作为《法兰克福报》的记者游历南方。在火车上偶然听到一则传说，一则不足信的故事。这太离奇，因此我立即对自己说：你得去一次。

给我作证的那些人说，在那个岛上，年轻小伙子通常去游泳的安通斯湾里有海豚。您知道，它们是些挺机灵、乐合群、好嬉耍的动物。其中有条海豚同一个叫肖利洛的勇敢的小伙子交了朋友。肖利洛是个西班牙名字，是小水珠的意思。开始时，它还有些畏惧哩，但不久它就亲得竟让这个不相称的伙伴骑在它背上，跟他一起玩，驮着他破浪过海。肖利洛一喊，它就急忙游过来。它象《浮士德》第二部中的鱼那样好奇。一喊‘西莫，西莫’，海豚就会应声而来。要是普利尼*可信的话，您可在他那里读到类似的报导。

火车上的人说，海豚甚至走水路把它的伙伴带到渔村周围，这样就缩短了他的工作路程，因为肖利洛是安通斯的送信人。

这些就是我所听到的。当然，我不信这种事，尽管这些人自称是从船上亲眼目睹这个动人的场面的。而我却认为，可能是某个爱开玩笑的人重述小普利尼的童话，就象那有名的海蛇的传说那样，酷暑天日里偶然会有这样的事的；或者肖利洛骑在一根大木头或橡皮海豚上，这类东西在海滨浴场到处能买到。反正，不管怎样，我决定到当地去把这件事情弄个水落石出。

乘前面提到过的船可抵安通斯岛，需要时，该船每星期从海湾启航一次。当然，途中我会好生举目张望的。”

“噢”讲故事的人重又斟酒，这时我思忖着：“现在他马上要提到‘船栏’这个词儿了”，因为他是热衷于顺着语言的路子走的。果真如此！

“我身倚船栏。海豚也确有其事，它们仿佛是由波涛转变成动物的。它们总是伴随着我们的船。这是一个常见的逗人乐的画而，当然叫人百看不厌。但却没有看到那位骑海豚的人。

一条船头有两只大眼的小舟——就象在希腊的洗眼杯上看到的那种眼睛——将我送上岸去，到当地唯一的宾馆。在南方连寒伦的投宿处也叫做宾馆。安通斯的这个小旅馆

* 普利尼(Plinius)，大普利尼(Plinius der Ältere)32-79；小普利尼(Plinius der Jüngere)62-113；二人系养父养子，均为罗马文学家。

（它的名字我忘了，好在这与事件无关）地势迷人，一看上去就给人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那个山鬼状脸形的侍役阿波罗给我安排了间简陋的房间，凭窗望去可俯瞰整个海湾，橙色的海滨，拖曳到岸的彩色渔船以及环抱码头的高地。海角宛如巨狮头，俯卧伺饮。”

实有诗意的联想给我的客人喝酒的好机会。接着他又继续往下讲：

“刚才您怀疑阿波罗这个名字。我曾有一个黑人佣人，他还叫朱庇特*哩。起初侍役阿波罗公然怀疑我。他丑陋的容貌是对所有美的挑战，在艺术上也可称之为美的悲惨的对位。他那琥珀色的山羊斜眼，注视人时令人寒栗。他那使劲吸嗅的鼻子，也叫人惊慌失措，因为连他那圆圆的鼻孔看上去也咄咄逼人。他的嘴，就管它叫做嘴吧，大而隆起，犹如一个胚囊的入口。他的耳朵也大，一只耳朵上夹着一段咬短了的铅笔头。他的皮肤细嫩似玫瑰，使人感到他的脸裸露在外象一碰就破的样子。泛红的稀散湿发松弛地耷拉在充满忧虑的前额上。如果这个可怜人想谈恋爱的话，那他就太倒楣了，因为谁会爱他呢？他体态畸形，走起来有些跛。您会懂得，他马上引起了我的搜集热情。

我细心周到地备好望远镜和照相机，在旅馆前平台上那张圆桌旁的一张普通白色金属椅上就座，这张桌子也有全世界咖啡馆通常备有的大理石桌面。我要了酒，欣赏周围景色。我的上空是红白色苍穹。

阿波罗腋窝下夹着餐巾——他的灵魂——，端来了我所要的东西。他总是餐巾随身，有时把它搭在臂上，甩在肩上或藏在袋中，巾角却显露在外；有时把它塞在围兜中。我想，他夜里会把它放在枕头下，同它一起睡觉的。他戴着白围兜，上面罩了件暗色毛外套。

我的在场看来使他不安。

‘您是为了那条鱼来的，先生？’——他顺便问道。说时，他按我所愿，拿起兰色饮料喷射瓶，给我向酒中灌苏打水，不时发出啞啞声。

‘海豚并不是鱼。’我答。

‘完全对。——您是从大陆来的？’

‘是的，在那里听到了这事。’

阿波罗作一遗憾的手势。

‘是警察？’

‘不完全是，是报社的。’

‘噢，’阿波罗轻蔑地说，‘那您是记者？’

‘您感到惊骇吗？’

‘坦白地说，是的。如果没有记者，世上出的事就会少些。’

‘您把因果颠倒了，老兄。是某个地方先发生了事，我们才把它写下来。仅仅如此而已。’

阿波罗看着餐巾，它在他手中真象一个有灵感的生物。他思虑了片刻。

* 朱庇特（Jupiter）古罗马神话中最有权威的雷神。

‘请原谅，’然后他说，‘您难道没有觉察，什么地方一出现记者，就会发生不幸吗？我言过其实了。’

‘您把我们估计过高了。’我插嘴说，同时请他坐下。

‘谢谢，先生，我从来不坐。由于您的职业原因，当然您渴望向读者报导些趣事。您们指望着并且招惹着这些毫无价值的祸害。这祸害也乐于担当这一角色，这样它可受到重视，于是它热心地给您们提供素材。’

他聪慧的脸上显露出祈求的神情。

‘让我们这儿平平安安吧！我求求您！’

‘可是，亲爱的朋友，如果在这个美丽的岛上，在这壮观的海湾内发生了那样惊人的事，总不能由我来承担责任。再则，除非我亲眼目睹，我是不会相信这些的。’

‘可是事情的确如此，’侍役叹惜说，‘要是您干脆相信了，认为理所当然，那您就绝不会想起这儿来的。实在这事同您毫不相干。’

‘请您原谅，’我答，并用望远镜搜索海湾，‘说到底，这件事绝非平凡。这事传说纷纷，海豚——对了，它不是鱼类，而是热血动物，是胎生的——我说的是，据说有只海豚同一个年轻人结下了亲密的友谊，它象狗那样温柔顺从，年轻人一唤，它就游到岸边，把他荷在背上，据说只背他一个人哩。’

‘只背他一人。’侍役颌首说。

这儿我得提一下，我们的谈话不是连续进行的。阿波罗很忙。他还要招呼别的客人，那些当地人。他们不象我这个外来人在阳光下，而是在里面阴凉的屋内喝黑葡萄酒。但阿波罗常到我这里来，我也不放松他。

‘无疑编得扣人心弦，但我才不信呢。’

‘看来您想像力欠佳。’阿波罗说。显然他想气气我。

‘果然不出我所料！听您这么说，这是个故事咯。我们的海豚是无稽之谈。好了，请拿帐单来吧！’

阿波罗根本没有注意到我的要求。他又忙于那块餐巾，一会儿把它褶皱，一会儿展开。那块有种种折痕的餐巾在他手里活象栩栩如生的生物体，时而象只海鸥，时而象朵花或天使，或者像尾鱼。他尽讲了些离奇古怪的话，同海豚毫无关系，至少我是这么想的。

‘科学认为，’他踌躇地说，‘它甚至无懈可击地证明了某些极小的物体有一种在不同的空间同时存在的特性，不管看来是何等地背乎理性。’

‘完全正确。它们正是这样做的。’我答。

‘在我亲眼目睹前，我不信。先生，您见到过吗？’

‘没有，当然没有。’

‘但您信吗？’

‘当然相信。’

‘当然！’

我一点也不知道，他意向何在。此外，我当时正注意着旁的事。一个赶着山羊的牧